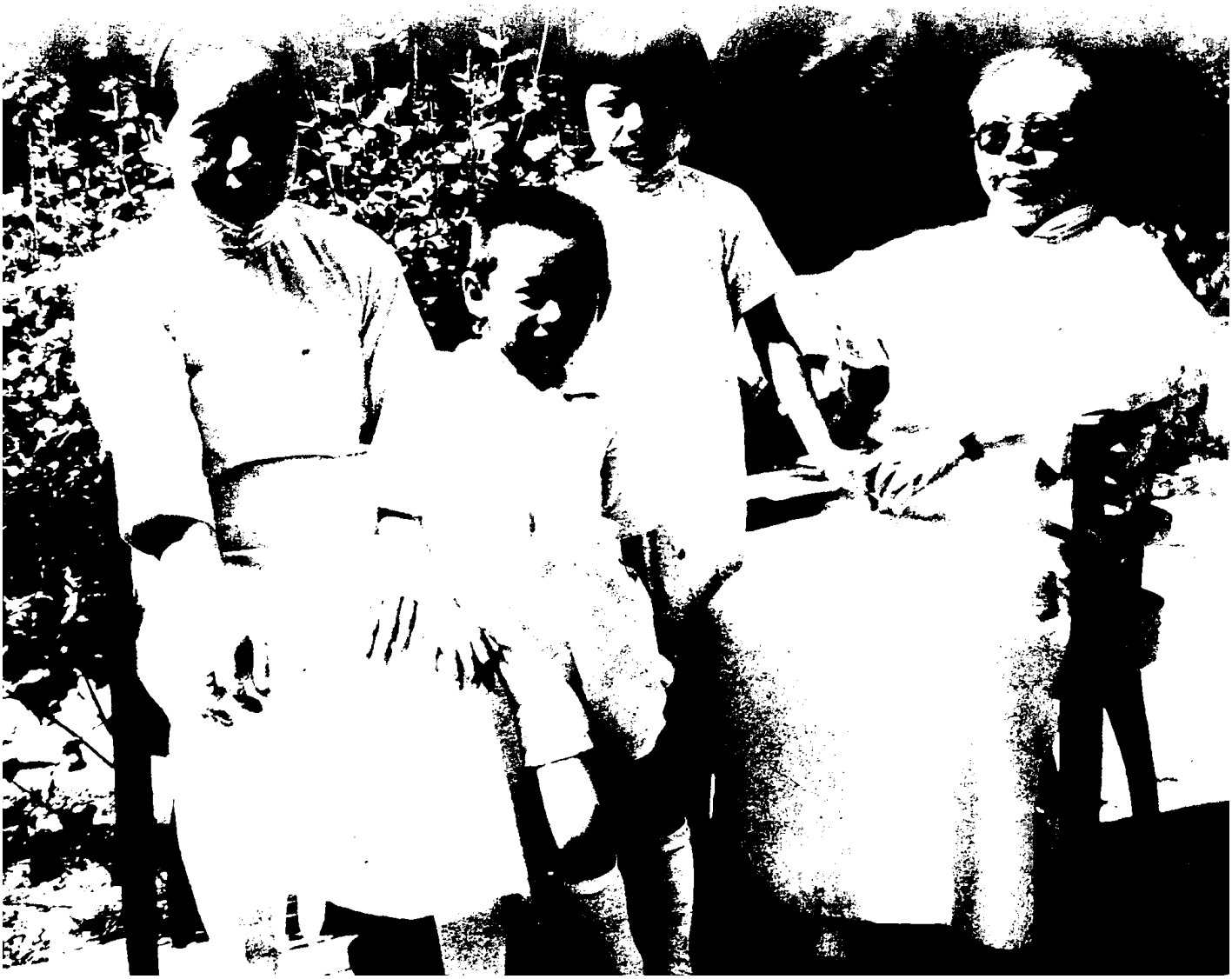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



怀念父亲

《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序

天降王师壶浆迎，
江东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惊奇略，
横海千军扫逆鲸；
三载鏖兵除暴政，
万民额手颂新生；
秦皇汉武都陈迹，
从此趋风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清朝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洲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却在烽火声中的五月二十五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

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一八九一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的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一九一四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世，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二十年代做的最高官职是京都市政督办公署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到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而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最后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



1917年8月，吴祖光诞生百日时与父亲吴景洲、姐姐吴珊在北京合影留念

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四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清朝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戇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还为这件事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一书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完成写作的对所谓“故宫盗宝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

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父亲卧病达八年之久，一九五五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一九五八年十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五月十四日去世。



父亲和母亲。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申请返京奔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父亲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没有改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三宝”的三幅大画 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徙，文物损失惨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不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

奋，尽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如今感谢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这一部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本文开头的一首七律和这本《魅影录》殿后的三首七绝，即摘自这本题为《风劲草》的诗集之中。

为父亲这本遗作的出版写这篇序文，欣慰之余，勾起对逝世二十三年的父亲的无限哀思。一九三七年我初入世途，任职于当时的国立戏剧学校。因抗日战争起，迁校于长沙，父亲从武昌寄了一份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的文字材料，并写信给我，希望我用这个题材写一个话剧剧本。我以初生之犊的勇气，按照父亲的嘱咐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个多幕剧，并从此开始了以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现在以这篇短文为父亲的遗作注解，也作为对父亲永远的纪念。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北京

油灯的火焰在摇着，颤着，说着那再也说不完的故事。它说故乡仍在，家人无恙；说那花白了头发的老人在等着我们回去。

《寒夜思家》

永世难忘的恩情

怀念母亲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晚，我应邀去前门外广和剧场看一场来自东北本溪市京剧团的演出，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后台工作人员在场边低声唤我到后台去接电话。

电话里听见儿子欢欢的声音，说：“婆婆去世了。”

我感觉一阵晕眩，伤心，悲痛，但更多的是惶恐和愧悔。娘的一生，历经灾难，苦恼远远多于欢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应是最为幸福的日子里，从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之后三年，以及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革”十年，娘所承担的苦难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而究其灾难的根源，却完全是由于她的儿子——我。照老的说法，真正是“不孝儿罪孽深重”。

娘姓周，名景姚，嫁到吴家，改名琴绮，生于一八九四年，即清光绪甲午二十年，今年应是九十六岁了，出身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人家。留着胡子的清瘦的外祖父曾来过北京我家小住，那时我很小，但留有印象，而且是好印象。为什么是好印象呢？因为听娘说过，那时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娘的脚却没有缠成祖母那样的“三寸金莲”，而是接近于现代女孩的天足模样。原因是大人给她缠足时，稍一用力她就大声哭叫，而外祖父立即进行干预，才落得现在接近大脚的形状。娘是外公的第四个“最小偏怜”的女儿，于是得到比三个姐姐更多的怜爱。因此我也喜欢我的十分慈祥的外公，虽然只有很短时期的相处。

父亲弟兄三人，伯父行二，叔父行五，父亲行三是当中的一个。三兄弟出自江苏常州的书香世家，都是诗书的行家，尤其父亲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因此交游十分广阔。他从二十几岁便来到北京扎根立业，北京古都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书画古玩店的老人们至今还有人记得吴三爷是频频光顾的客户。由于父亲的交游，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在家里食饮亦是常事，因此母亲便常常要亲自去指挥厨师置办膳食。而我家还有最受尊崇的祖母是长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的素食则总是由母亲亲自下厨置办，从不假手于厨师的。

母亲的更重的负担是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她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生过十五个子女，七个男孩，八个女孩。其中一女三男早年亡故，成长起来的七个女儿、四个儿子则至今健在；最大的姐姐已经七十六岁．最大的男孩则是我，今年七十三岁了。

这样一个老少三代、多子女的家庭中，母亲上有婆母，中有交游广阔的丈夫，下有众多子女，可以想见她的负担会有多么繁重。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日常的佣工除门房、厨师和服杂役的女佣、祖母和母亲各从南方带来一名丫环之外，经常还有两个到三个奶妈。因为婴儿不断出生，而母亲却不能亲自给孩子喂奶，事实上她即使能够喂奶也不可能喂这么多的儿女的。

娘给我留下的最美的品德是她对所有受雇佣工的友善关系。终其一生，任何人也没有看见过娘对她的佣人有过哪怕是丝毫的疾言厉色。忙了一天下来，和奶妈、佣妇们坐在一起闲谈，是她很大的乐趣。我们家的两个来自南方的丫环都是在二十岁左右，由娘为她俩选定对象，像嫁女儿一样陪送了新制的衣物嫁出去的。年长一些的小珠嫁到南方，后来断了联系；年轻些的小玉嫁给在北海公园船坞的职工小陈，几十年来和我家像亲戚一般来往。两个女孩结婚离开我家时都哭得泪人儿一样不愿舍去。对这么多的



1917年8月诞生百日时与母亲合影。

女，娘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更不用说对更多的亲戚朋友了。我们家的亲朋也很多，父母亲有许多表兄弟姐妹，尤其是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姨和表姑们；这些女孩子有时在家里怄了气，常常跑到我家来找“三嫂子”诉说委屈，娘就常常留她们住几天，消了气再回家。这个“三嫂子”是个最可亲近的人，在亲朋里是出了名的。

祖母是很有威严的老太太，在孙辈里最喜欢我，每天下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我做功课；此外还教我读唐诗，并且很多年和我睡在一床。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在北京，本来是规定由三家轮流奉养，但是却和伯母与婶母都难以长期相处，都是接去不多时就又回到我家，最后终于长期在我家住下来终其天年。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外滩租下一栋楼房，把父母亲和众弟妹连同祖母一起从南京接来住在一起的。

近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频，百姓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从祖母、母亲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她们讲述当年所谓“长毛造反”的悲惨景象；而我们亲历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在这之前，由于父亲作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而经受了后来轰动全国的“故宫盗宝案”，由于仗义帮助朋友而受到株连，最后带领全家老小离开北京出走南方。我至今记得母亲在举家迁徙，默默地收检大量行李家什的辛劳。父亲是一个出手十分阔绰、不会算计的文物收藏家，终年累月除去办公时间，经常去琉璃厂收买字画古董，为此长年负债，每年三节时候——即春节、端阳、中秋——债主盈门讨账，最多的是古玩商人，也包括粮店、裁缝乃至书商、饭庄……经常在门房里坐满了要债的，弄得全家气氛紧张。这就联系到我前面所说，母亲从无疾言厉色，但有时痛苦得泪流满面，就是对父亲的大手大脚、漫无节制地收买那些字画文物的时候也是如此。父亲我行我素，是决不听母亲的劝告的，但因此却连粮店都欠了债，母亲苦口婆心也不见效，就只有以泪洗面了。



童年吴祖光（左）与姐姐。

至今我还记得的是：学期开始，我们兄弟姐妹连学费都交不上，父亲只好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信都是由大姐

吴珊交去的，大姐觉得太丢脸，只是对娘诉苦，撅着嘴。娘也只落得叹气、流眼泪，没有别的办法。

一到搬家，和后来的抗战时期的向西南大后方逃难，这些文物字画就成了更大更沉重的负担。照父亲的主意，什么都可以不带，也不能不带这些东西，尤其是几件所谓“镇库之宝”的字画更是紧紧抱在手里的，看来比孩子还重要。那时候，母亲是多么沉着！多么稳重！反而是一句怨言也没有，紧紧地保护着这些东西和她所有的孩子们——这一切都是她的宝贝。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四川，到重庆，到江安，又回到南京，再到上海……老人和孩子都健在，古玩文物保住了最名贵的。只有祖母，最后是由于年老而过世了。

一九四九年结束了全国内战，也结束了百年来祖国大地一片呻吟、血肉模糊的离乱生涯；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满目祥和景象。我也怀着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辞去香港电影编导的职务，应召回到离别十三年的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新兴电影文化事业的怀抱，从事“前人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并且在一九五一年和新凤霞结婚。一九五四年用我从香港带来的一点钱和少量借款买了位居北京东城最繁华地带的有十八间房屋和满院花木的一所四合院。买屋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把年迈的父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做两老的终养之所，那时父亲已因高血压中风而卧床两年了。

把父母接来首都北京的头一件事便是劝说父亲把数十年长途颠沛幸得保全的一大批珍贵字画文物捐献给国家。因为这几十年全家大小竭尽心力才得保全的这批文物终于安全抵达从此获得平安、不会再生变乱的人民首都；可以说由于全家的努力，它们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几十年来父亲辛辛苦苦、不惜负债累累、竭尽心力收买保存下来的这批文物，其目的原不是为了居奇致富，而完全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爱好和珍惜。我没有想到，我想父亲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会是传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财富。因此我的建议一经提出，父亲立即点头同意，那时父亲说话已不方便，吐字十分吃力，但是头脑仍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只能斜倚在病榻上，但仍是热烈地欢迎了我邀来鉴定并欣赏这批文物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父亲的老朋友郑振铎先生和唐兰教授。

两位文物鉴定的权威人士十分兴奋地看完之后同时提出这一批贵重的文物如何计价的问题。我说这是无偿的捐献，不需要任何报偿，这是父亲和我早已决定了的。在过后两天由故宫博物院派人来将全部捐献件清点登记取走，出具收据共计二百四十一件，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列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的文物收藏家、爱国人士、外国友好人士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的情况，并发表了重要捐献者三十个人的名单，其中头一个名字吴景洲便是我的父亲。文中指出：这些人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

回想起当年捐赠结束之后，全家都有卸下重担的轻松之感。其中感受最强烈的是娘，她在这转徙流离的十余年万里征途中打包装卸、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已经无从计数……而这一回她说：“这才是真正解放了。”

五十年代是中国四亿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无限希望的年代。从百年的积弱转为强大，从举国大乱转为大治，展望前途一片光明。一百年来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幸福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比兴奋、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把父亲、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同时亦来迎接这样甜蜜温暖的新生活的。但是绝对不能预料的是这个新兴的国家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好像无法容忍，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的批判，“胡风事件”的批判……这还只是针对一些个人或少数人的批判，发展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扩大为针对全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了。当然，“批判”知识分子的也全是知识分子。这里面，我是属于揪出来示众被批判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是，我竟成为全国戏剧界重点挨批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我完全糊涂了，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是伟大的领袖发出庄严的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吗？要求大家对党提意见，指缺点，提建议吗？再三指出：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但是在种种的“诚挚”而又“谦虚”的动员之下而提意见的爱党爱国人士，转眼间被提出了一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紧接着便被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反右派成为一个运动，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

按理说，就我一家而言，右派的比例不算太大，我兄弟姐妹十一人，其中长姐远在建国之前便去了台湾，十人中除我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我的一个小七妹由于反右前在云南接待我的来访，从而传播过我的一些片言只语亦被株连划为右派。毕竟十人之中只占了二人。然而我是大哥呀！小弟弟小妹妹脱不了干系，其中一个被保送出国赴苏联留学的小弟竟被命令回国接受审查达数月之久，最后被清洗思想之后才得幸免。

但是最为悲惨的是我还株连了妻子。这个自幼从南方被卖到天津，在贫民窟长大，六岁学戏，十四岁成为主演，以其卓越的天赋，不数年征服了万千观众，名噪海内外的天才演员，在作为丈夫的我被打成右派之后，居然有一位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长召她去谈话，当面下令，要她与丈夫划清界限，离婚，便可入党，否则要“承担后果”。

然而连我亦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生来胆小怕事，照她自己所说的“旧社会怕警察，新社会怕干部”，连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新凤霞，这一回面对一位来自老区的主管部长、大干部竟“不买账”,公然抗拒，不愿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在听到要把她的丈夫远遣边荒之后，竟说：“要等他回来。"等多久?"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等他二十八年。”副部长安得不怒？拍桌子，把她逐出办公室。

一路哭出中央文化部楼上长甬道的新凤霞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去剧院上班时迎头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着大门的是一幅很大的漫画，画一个戏装的相府小姐抱着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吴祖光，满面流泪地哭喊：“我等你二十八年呀……”然后全院开大会批斗，宣布新凤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戴上了右派帽子。

但是剧院仍要指靠新凤霞演出卖钱。只要是新凤霞主演的剧目登出广告，立即满座。她不参加的演出，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但是后台还要贴上大标语：“右派分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每晚演出结束，场内观众热烈鼓掌，要求演员谢幕时，谁也不知道，他

我对自己很失望，虽然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却还是十分幼稚，极不成熟。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写剧本，进入文艺界，成了一名所谓作家，至今不觉过了半个世纪。不知为什么道路一直很不平坦,受到很多压力,吃了不少苦头。追寻原因都是这枝笔爱写，这张口爱说之故耳。事过境迁，每次都想到：所有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可以不说,也可以不写 譬如，为什么人家就没说也没写呢？而且，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为此吃苦,若是苦我一人也就罢了，却教妻子、儿女受了株连，害得他们也没有好日子过。最苦的是我的妻子——一个多好的演员无辜受累，竟至成为半身瘫痪；甚至得病以后仍旧为我而心惊肉跳、梦寐不安。一听到我又要写什么、说什么了的时候就双眉紧锁，苦不堪言地对我说:“你呀 又是闲得难受,没事找事啦,你给我老实点吧!”

《吴祖光闲文选》自序

们热爱的新凤霞已经被“革命同志”勒令去打扫厕所或是清理后台、倒痰盂去了。

在那以后，我被遣送到极北边的北大荒，没有期限，不知何日归来。妻子为避免不测——那些同台的演员，包括合作十多年的伙伴，一下子都换了一副敌视的眼光——在丈夫遣走之后立即搬到剧院去过集体生活了。

后果是什么呢？我的重病的父亲，三个年幼的子女，一座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全副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

三个孩子，最大的吴钢，幼小时由外祖父母照顾较多，现在则由祖母照管了；二子吴欢则是出生不久便被送到上海由祖母代管抚养，正如我小时最受我的祖母宠爱而有几年受祖母教养一样，和婆婆感情最深；小女儿双双也全交给了婆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是我六妹的女儿能能，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于是母亲除要照顾病瘫在床的父亲之外，全部接受了四个孙儿孙女和外孙女的沉重负担。

我至今记得一九五八年初春，天气陡变严寒，大雪漫天，我被勒令远行北大荒。头一天的深夜，娘走进我们房间对我说：“你好好走，家里只管放心。我一定帮着凤霞替你看好家，等你回来。你放心，放心。一点也不要担心。”

娘重复地说着“放心，放心……”我有九个弟妹留在灾难频频的祖国大陆，但谁也没有我的灾难深重，都具备奉养老母的条件，但娘信守诺言，应付种种艰难，一步也不离开我家。

在我离家的三年里，凤霞单身住进有无数双敌视眼睛的剧院，只在周末和节假日里回家匆匆探视老人和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

当然，很快对此就有了答案。据说号召大家对党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原来是一种策略、一条妙计，叫做“引蛇出洞”。然而从此以后，万马齐喑，隐瞒真情，专说假话，再也听不到真话了！成了这样的状态，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后的三年，我被流放，凤霞被迫离家去做那受虐待、受唾弃但仍要承担主演繁重任务的可悲角色。我家的朱红大门上经常会被邻居涂上大字，什么“大右派”、“反革命”之类的侮辱性名词，甚至有人

会来欺侮我家年幼的儿女……这一切沉重压力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身上。

三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期，加上一个病残的老人；母亲不单是负重而且还要忍辱，这真是从何说起？但老人却一步步走过来了。

一九六〇年底临近新年的时候，我闯关万里，居然“幸获”生还——因为有不止一个同时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相比之下，我竟成了幸运者。

六十年代初期那几年，我过了一段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于一九六〇年底从黑龙江虎林县回到家里，与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终于团聚，但永远失去了父亲。三年以前大雪纷飞，走向北大荒万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负行囊去父亲住室向老人告别时，老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告别，他只是向我点头笑着。父亲的笑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回忆。

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亦是用满面笑容迎接我的归来。她说：“我现在可以把凤霞、大牛(长子吴钢的小名)、欢欢、双双，还有能能都交给你了。”

接连几天，素来不多言语的母亲，坐下来便讲述三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的往事。譬如这个三年还是近代史上罕见的“灾荒”的三年，国家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吃的，全家经常处在饥饿状态里。每个月发工资时，凤霞要从剧院里送钱回家住一晚再走。这时，当家作主的婆婆便细心地、几乎是数着粮食下锅。吃饭时总是先把凤霞的碗盛满，并告诉孩子们：“妈妈演戏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饱些。”然后才依着年岁大小分给每个孩子一份，最后留给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小双双的碗没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没有摔破，但是米饭连菜汤全泼掉了，孩子们把地上的饭抓起来往嘴里送，顾不上地下有泥土……这真是一场惨剧，但现在却当做笑话来讲了。



母亲。

饱经忧患的母亲永远是稳重的、宽厚的。过去的总会过去，没有抱怨，更没有愤怒。提到还没有完全好转的饥荒年月，母亲说：“早就听说外地灾荒的悲惨事，河南的一场‘荒祸’，一个省就饿死了多少万人。比起来我们过的就是神仙日子了。”母亲又永远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国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亲说的“过去的总会过去”，六十年代的前半期确是比较安定下来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社会亦好像走上了轨道。就我家说来，一场滔天大祸之后重获安宁何其可贵可喜！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最会满足现状的，“平安即是福”，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会教人忘怀过去了的灾难。然而事情却总是向着人们的意愿逆施倒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出了一个阴毒凶险、集天下万恶于一身的女妖江青，并从而形成一个为祸十年的“四人帮”，把刚刚复苏的中华大地推落到万丈深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好河山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转眼之间，我又成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顶被挖通，墙壁被掏破，地板也被撬开，说是要搜出暗藏的电台和武器……年轻的学生变成了暴徒，住在近处的高干子弟几次随便出入我家顺手牵羊把喜爱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一家重担又落到比反右之难时更加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全家、孩子们，连被拘押的儿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长大了，已经十岁的小吴霜居然能够从和平里乘无轨电车换公共汽车送饭到妈妈的拘禁处，而且还能以不卑不亢的气概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红卫兵们。

谁也料想不到，这种恶毒专横、荒唐愚蠢、残酷暴虐、颠倒黑白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竟会延续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开始我和许多许多同难者一样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一九六九年得到约一年时间的自在逍遥之外，约八年时间被隔离监管。不准与家人亲友联系，更不用说相见团聚了。“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恣意横行竟至于此，真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糟蹋得成什么样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较有限制的自由。这个为千百万观众热爱的演员在干什么呢？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十几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湿，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毕竟她得

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末亦可在家休息。这样，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干家务总算有了帮手，但只是担心她的儿子我这个长期受审查者的安全。

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我的因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刻，居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五十年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五十年代的全家福。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一九七五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